

從語言使用和心智系統探討台灣跨語世代*

林映彤

陽明交通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詹斯閔

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文學組碩士

摘要

台灣經歷過數次的語言轉換，在文學領域中最常被探討的是戰後從日語文轉換到華語文的「跨語世代」。本文將探討語言轉換對跨語世代的文學家造成心智結構上的塑造和影響。本文從「外語效應」談起，並擴展心智哲學中的「破碎心智」觀點，提供對跨語世代經驗一種新的理解。相較於使用母語，「外語效應」指在使用外語時，在決策上會展現不同的模式。本文論述不同語言的使用切割不同的（社會）環境互動脈絡，使得長期使用母語所習得的社會與環境互動方式、思考和行為習慣，保留在母語使用時的互動，不會完全轉移到外語使用時。此切割不只存在母語使用與外語使用之間，也存在不同外語使用之間。另一方面，心智哲學的「破碎心智」觀點主張，信念並非安置在單一沒有矛盾的信念系統中，而是存在多個信念系統。不同的信念系統用於回應不同的社會或環境脈絡。此觀點可擴展至其他心智狀態，例如記憶、情緒、想像。據此觀點，使用多種語言的人具備不同認知和行為模式。此可理解語言轉換對於台灣跨語世代的文學家帶來心智結構的影響；及他們當時處境。除了在文化、社會、政治上的轉變之外，語言轉換也帶來在認知上的另一層次轉化。

關鍵詞：跨語世代、破碎心智、外語效應、認知、台灣文學、林亨泰

* 本研究由國科會「自我敘事與科技：探討數位科技在形塑自我敘事中的多元角色」（113-2410-H-A49 -042 -MY3）與法國國家研究署（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Agency, ANR）「未來投資計畫」（Investissements d'avenir）（ANR-15-IDEX-02）支持。也感謝「2024 台灣哲學與文學文化的交涉」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和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建議和回饋，以及 2022 年國北教台文所「台灣跨語世代作家文學專題」課堂同學和陳允元教授帶來的啟發。林映彤負責心智哲學與心理學領域的理論探討，詹斯閔負責跨語世代文學的文獻分析與整理，兩人共同進行跨領域分析與論文撰寫，貢獻相當。

A Study of Taiwan's Translingual Generation through Language Use and Mental Systems

Lin Ying-Tu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o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an Szu-Min

Master of Arts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aiwan has undergone several linguistic transition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frequently discussed is the postwar shift from Japanese to Mandarin Chines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translingual gene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uch linguistic transitions shaped and influenced the mental structures of writers from this generation. It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then expands the notion of the “fragmented mind” from the philosophy of mind to offe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ingual experience. The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people tend to exhibit different decision-making patterns when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compared to their native language. We argue that the use of varying language segments interaction in distinct contexts within one’s (social) environment. Consequently,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habits, thought patterns, and interactional routines developed through long-term use of a native language tend to remain confined to contexts where that language is used. These patterns do not fully transfer to interactions conducted in a foreign language. Such segmentation occurs not only between native and foreign languages but also among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s. Meanwhile, the idea that individuals can hold incompatible behavioral patterns or even conflicting beliefs has recently given ri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ew known as the “fragmented mind.” This view holds that our beliefs are not housed within a single, internally consistent belief system, but are instead distributed across multiple systems. The fragmented mind view can also be extended to other mental states, such as memory,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multilingual individuals exhibit distinct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depending on the language they are using. Such a perspectiv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linguistic transitions have shaped the mental structures of Taiwan’s translingual generation, thereby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experiences. Beyond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linguistic transition also effected a more profound shift at the mental level.

Keywords: Translingual Generation, Fragmented Mind,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Cognition, Taiwan Literature, Heng-Tai Lin





一、引言

1985年林亨泰（1924-2023）提出「跨越語言的一代」來描述戰後面對語言政策轉換，被迫學習新的「國語」的這群台灣作家：「光復當初，銀鈴會同人的年齡都在20歲上下，不像他們年長的前輩們，還可以在基礎教育階段或接觸到一些漢文，他們可以說是從小就受過最嚴格日語訓練的一代。」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跨語世代」這個題目的歷史複雜性。雖然林亨泰討論的主要標的是出生於1920年代前後的作家；不代表生得更早或更晚的作家，沒有遇上「跨越語言」的困境。

1937年日本政府下令廢報紙的漢文欄，使用日語的強制性逐步提高。1945年8月二戰結束，台灣人迎來新的政權，1946年國民政府下令禁用日語。短短九年間，台灣人面臨語言政策的一再轉換。對於生在日本時代的台灣作家們來說，更是一大考驗。這些作家們，隨著出生年分、政府語言政策的方針、成長的族群背景與受教環境，可能有不同的語文素養；以致於，面臨語言轉換之際，他們各有不同程度的量能，來面對與學習新的語言。例如，很早就開始嘗試白話小說的賴和（1894-1943），還有台南鹽分地帶文學的代表人物吳新榮（1907-1967），童年都有受過漢學教育。然而，漢學書房教的漢文、知識分子書寫的「殖民地漢文」與戰後通行的華文不同；會讀寫漢字也不一定代表會說華語。戰後，作家們各自跨過語言的歷程多樣複雜，且有多重因素交織其中。要如何建立具通盤性的研究視角，用以觀察不同的跨語案例；本文欲進行初步嘗試。

二、台灣的跨語世代與相關理論

（一）廣義的跨越語言

跨語世代一詞出現，林亨泰最初是用來描述和他一樣出生在1920年代的本省籍台灣作家。然而事實上，不只那個世代的作家面臨跨越語言困境。比林亨泰大十多歲、生於1910年代的龍瑛宗（1911-1999）這樣描述自己戰後的語言經驗：

光復一年後，霹靂一聲日文禁止了。以日文創作的作家來說，等於斷臂。當時，除了客家話之外，只有略通閩南話而已，至於白話古文都是一竅不通。

如果，你要繼續創作的話，必須從孩童做起，爹爹、奶奶、大家、你好等名詞學起來。我也跑過國語講習所去，滿堂的老幼男女台灣同胞，緊跟著老師的口音，張著嘴嚷著：「大家一起來學國語吧！」……學國語當孩童的我，其實已經幾近四十歲了。¹

若要擴大跨語世代的研究範圍，不限於林亨泰所稱的 1920 年代生的、日語世代作家，個案的歧異性更大，便有更多需要關照的面向。好比說，作家本來具備哪些語言文字涵養，可能影響著他們跨語的門檻高低。日本治台 50 年間，有多種語言、文體共存競合；作家們因自身認同或想像，鼓吹並嘗試不同種語文系統。從陳培豐這段話能略窺一二：「急遽的『國語』政策轉換以及隨之而來的語言文化暴力，改變了本省菁英的世界。在識讀基準的變更下，無論是過去的『中國白話文』派、臺灣話文派、日語派，皆成了『文盲』。」² 林亨泰大致可以對應到這裡所說的日語派；除了日本語文之外，其實還有其他種讀寫系統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上出現。所以終戰後，不是所有作家都站在同樣的語文基礎上，面對戰後通行的華語文。或許這也是龍瑛宗在前段引文中，要強調自己白話古文都一竅不通的原因。

跨越語言這個現象，在台灣的歧異性還表現在其他面向。某些出生得較早、³ 活躍於日治時期的作家，甚至可能經歷兩次的語言斷裂。1911 年梁啟超來台時，推薦林獻堂用他自創的日文拾讀法，學習閱讀日文讀物，以此涉獵近代文明相關的論著與思想。生於清治時期，接受傳統漢學教育的林獻堂（1881-1956），其

1 龍瑛宗著，〈一個望鄉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陳千武、林至潔、葉笛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 隨筆集（2）》（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頁 32。

2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頁 323。

3 究竟出生多早的作家，才會遇上兩次語言斷裂？1902 年日本政府逐漸減少公學校漢文科的授課時間，此後傳統漢學書房和日本政府的公學校在數量上，有此消彼長的趨勢。1922 年隨台灣教育令的改正，公學校漢文科從必修科目改為隨意科目，許多公學校直接將漢文科排除（見註 4 頁 100、頁 183、頁 299）。生於什麼年代的台灣作家，可能有「漢學—日文—戰後華文」兩次的語言跨越，或者是「漢學和日文並行—戰後華文」複合的語言跨越軌跡？從日治時期語文教育的沿革，似乎有跡可循。然而個別作家的案例殊異，從教育政策切入考察作家的「語言世代間之差異」是否適切，需要更縝密的研究和考證。值得另闢專文探討。

實不擅日文。⁴ 此外，1917年胡適在中國提倡白話文運動，黃呈聰和張我軍等人以對抗日本國語教育、反封建為目標，也在台灣宣揚「中國白話文運動」，販賣和刊載來自中國的中國白話文內容。⁵ 或許有些作家在這一波運動中，早就接觸到中國白話文／戰後華文（姑且視兩者為近似的系統），戰後他們並不是從零開始接觸新的國語文。從林獻堂的例子以及中國白話文運動在日治台灣的發展來看，個別作家在跨越語言之際，接觸與學習新語言的動機、背景條件和具體時間點都可能有所不同。

台灣的跨語現象有如此多樣性，在研究分析上，帶來一定程度的困難。本文欲借重西方的文學討論和哲學理論，為不同的跨語個案，找到能夠統合視之的觀點。歐美文學界也存在跨越語言的狀況，並以「非母語寫作」稱之。歸化美籍的俄羅斯作家納伯科夫（Vladimir Nabokov）母語是俄文；1951年他用英文出版自傳《說吧，記憶》（*Speak, Memory*）。幾年之後，紐約的出版商請他翻譯成俄文版；用母語書寫童年，可以觸及的內容變多。1966年他把這些擴增的篇幅放回英文版重出，納伯科夫寫到：「這段俄文的回憶，首先用英文重述；翻回俄文之後，再重新英文化。這是一個辯證性的工作。如此多重的變形，對蝴蝶這類生物來說很正常，過去卻從未被人類嘗試過。這點為我帶來一些安慰。」⁶ 先以非母語寫作，作家本人再擔任譯者，將原作品翻譯成母語，當代台灣作家李琴峰有類似的書寫與翻譯歷程。⁷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納伯科夫用母語寫作，提取出回憶裡的更多細節，這和本文將談到的理論，相互印證。

用法文書寫的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以《惡童三部曲》聞名。1956年匈牙利受蘇聯的高壓統治，克里斯多夫周遭的許多朋友，因表達異議，相繼入獄。克里斯多夫和丈夫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從匈牙利徒步穿越奧

4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0），頁314。

5 同註2，頁100-101。同註4，頁324-333。

6 David Robson, "I couldn't believe the data: how thin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improves decision-making," *The Guardian*. (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3/sep/17/how-learning-thinking-in-a-foreign-language-improves-decision-making>，檢索日期：2024.12.12)。

7 何致和，〈語言越境、形象自塑與文化交融——李琴峰非母語書寫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0期（2021.12），頁361-390。

地利，流亡到瑞士。按照自傳《文盲》（*L'Analphabète*）所述，接下來是他從母語匈牙利語「移居」至法語的跨語歷程。儘管法文不是最流利的語文系統，克里斯多夫自知不可能像以法語為母語的作家，寫得那樣流暢，但他仍然採用較有距離的法文來寫作：「我使用法文，而不是匈牙利文，是為了在我的恐懼和我的書寫之間，創造距離。」⁸ 小說內容大都來自克里斯多夫的親身經歷，和匈牙利的政治背景相關。評論家形容他的寫作風格是極簡主義，克里斯多夫排除情感豐沛的形容詞，以骨架式的簡要語言來陳述。陌異的書寫策略同時形成一種對抗，抵抗過去那段扭曲和受苦的經驗。⁹ 作家選擇非母語寫作，較少情感參與，在作品與真實生命之間產生了距離，這也是本文將提及的論點。

本文在此欲提醒，納伯科夫和克里斯多夫的非母語寫作，與台灣的跨語世代，仍有無法完全類比之處。非母語寫作這一詞，以及本文後面會談到的外語效應，存在著「母語」和「外語」的對立，這一組對立囊括了兩套語言和文字。可是許多台灣作家的學養歷程裡，「母語」往往沒有可對應的文字；台灣各種本土語言長期缺乏穩固和標準化的書寫系統，造成作家最熟悉的語言和最熟悉的文字無法一致。舉例來說，林亨泰認定自己的母語是台語，¹⁰ 龍瑛宗的母語則是客家話；但他們自幼書寫最流利的文字系統都是日文。

根據 1940 年總督府所做的「國語普及程度」調查，¹¹ 生於 1920 年代前半的台灣人，通曉日語的比率約為 51.2%，生於 1920 年代後半者大約是 60.2%。1915 年的調查則顯示，閩南人和客家人說自己語言的比例仍高於九成。¹² 當時本土語言的流失情形較不嚴重。由此推論，和林亨泰（1924 年生）差不多歲數的人，

8 Jennifer Krasinski, "Ágota Kristóf and the Uses of Illiteracy," *The New Yorker* (來源: <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second-read/agota-kristof-and-the-uses-of-illiteracy>, 檢索日期: 2025.04.15)。

9 Helen Oyeyemi, "The Rebel Vocabulary of Ágota Kristóf: Helen Oyeyemi on Kristóf's memoir *The Illiterate*," *Literary Hub* (來源: <https://lithub.com/the-rebel-vocabulary-of-agota-kristof/>, 檢索日期: 2025.04.15)。

10 呂興昌將林亨泰四〇年代的詩作，譯成台語，由林亨泰核定和校對。台語作為林亨泰的母語，「終究是他內心深處充滿乳香的夢！」見呂興昌，〈編者序〉，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林亨泰全集—文學創作卷1》（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此書序言部分無編碼，本文引用的段落，為〈編者序〉第3頁。

11 調查細項包含讀寫能力的區分，詳見林佩欣，〈日治時期的教育統計資料〉，《台灣學通訊》70期（2012.10），頁6-7。

12 所引用之數據排除掉，不理解國語但能讀者。葉高華，〈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臺灣語文研究》13卷2期（2018.10），頁260-262。

日文日語皆通暢，但母語是台語或其他本土語言者，應是多數。總地來說，跨越語言實際上涉及語言和文字兩個面向，單單用母語和外語這一組概念，很難全面描述台灣作家的跨語歷程。台灣文學的情境，必須更細緻地考察。

（二）回顧現有研究

文學研究如何探討台灣的跨語世代？有學者從報刊出版活動著手，兼談戰後初期的語言政策變革，如何影響跨語作家的生存與活動空間。¹³多數學者圍繞著特定作家進行研究，爬梳他們戰前與戰後的文學活動。例如柳書琴寫龍瑛宗於1945-1947年任《中華日報》文藝欄主編前後的作品。¹⁴王惠珍針對跨語作家的翻譯研究，¹⁵基本上也是以各別作家為骨幹來撰文。將跨語世代視為一個群體，用較具群體視角來探討的，是蔡明諺¹⁶、黃意雯¹⁷的銀鈴會論文。後來跨語作家如何以華文重返文壇，許多論述以文友通訊為核心。

上述研究都圍繞著作家們的文學活動，且都會提到作家們曾經跨越語言，但論者較為忽略，跨越語言為作家之文體選擇和美學風格，帶來什麼影響和轉變。彷彿跨越語言只是邊緣卻必要的研究背景須知。反過來說，如果研究範圍鎖定在美學和文學性層次，跨語作家容易落入「作品不夠優美精巧」的評價；無從看見，跨語無論作為劣勢或優勢，¹⁸作家們如何翻轉語言所帶來的障礙，以及跨語給作家們帶來什麼樣的挑戰。跨越語言這個重大的語文條件，帶來怎樣的美學風格、寫作內容的轉變和趨向？這是本文關切的重點，我們試圖從心智哲學的角度提供一種觀點。

13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223-270。

14 柳書琴，〈跨時代跨語作家的戰後初體驗：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1945-1947）〉，《台灣文學學報》4期（2003.08），頁73-105。

15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10）。

16 蔡明諺，〈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期（2015.04），頁41-71。

17 黃意雯，〈從銀鈴會同人誌看跨時代作家如何跨越〉，《台灣應用日語研究》18期（2016.12），頁87-104。

18 跨越語言帶來的影響，不盡然都是壞處。某些跨語作家憑著對日文的熟悉，借重日本文學的養分和資源，發展華文創作。例如張彥勳1964年寫的短篇小說〈妻的腳〉，很有仿擬谷崎潤一郎〈富美子之足〉的成分，描寫病態和癡狂的戀愛。

（三）理論解釋跨語現象

賴慈芸主編的《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¹⁹於2019年出版，裡頭有台灣文學背景的柳書琴、王惠珍和黃美娥共同參與。從三位學者的論述可以看見，不同時代有跨越語言經驗的台灣作家，往往也是翻譯家。身處複數語言的夾隙之間，作家們投入翻譯活動。王惠珍於隔年出版《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2020）將討論聚焦在陳千武、葉石濤、鍾肇政、龍瑛宗、楊逵與吳坤煌；前三位陳、葉、鍾就是林亨泰最開始提出「跨語世代」一詞時，具體指涉的對象。我們可以看見，跨語世代和跨語現象被放入翻譯研究之中，並且因此和翻譯研究所談的後殖民理論產生了連結。²⁰

曾巧雲²¹比賴慈芸等人更早用翻譯理論來看跨語，他借鍾肇政的自述，發明譯腦這個研究詞語。他運用後殖民翻譯的框架，為跨語現象提供理論基礎。她反對傳統翻譯理論觀點，將翻譯視為單純「原文的再現」，是「一種單純透明的語言轉換」。²²相對地，他採用當代文化翻譯觀點，「將翻譯視為一種跨越語境／跨越文化的實踐」。²³

曾巧雲依據尼蘭加納（Tejaswini Niranjana）的文化翻譯觀點，提供了對於翻譯的兩層分析。一層是點出翻譯涉及兩個文化位階不平等，且是為殖民者再現他者。而第二層則是新型的後殖民翻譯實踐觀點，翻譯的過程中，如何在殖民者的語言裡帶入他者的主體和抗爭潛能，來解構殖民翻譯。曾巧雲將此觀點用以分析戰後的跨語作家，他們透過翻譯日文原文，與戰後的文壇重新接軌；使得作為主流優勢的中文譯文，得以被顛覆和鬆動。跨語作家身為翻譯者，把差異帶進中文書寫之中，藉此體現了翻譯者的主體性。而他之所以稱之為「譯腦」，主要根據鍾肇政（1925-2020）的描述。鍾肇政談到自己的跨語歷程：

19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

20 源於西方的後殖民翻譯理論，背景大多是來源語較強勢，目標語是被殖民者的語言。這和台灣討論跨語的情境不完全相同，例如林亨泰等跨語世代作家，是從日語跨到華語，目標語反而是比較強勢的。必須思考，後殖民理論在台灣的情境是否完全適用。

21 曾巧雲，〈從譯腦到殖民地經驗的再翻譯——初探跨語世代的後殖民翻譯〉，《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2期（2011.04），頁135-161。

22 同註21，頁138。

23 同註21，頁139。

於是我先用日文寫完全文，然後自己再翻成中文，好不容易才完成了作品。……於是從純粹的翻譯階段逐漸地熟練，接著進入的階段到目前為止一樣地先以日文思考，然後在大腦中轉換成中文，再直接以中文寫在稿紙上。所以我到這一階段所寫出來的已經是中文，我稱這一階段為「譯腦」。……如此訓練的累積之下，進而不再使用日文，就直接以中文思考，以中文看文章，逐漸地懂得如何以中文表達。²⁴

我們認為曾巧雲的譯腦觀點捕捉了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權力關係（即便在台灣戰後跨語的脈絡並非一般典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語言文化關係），以及跨語作家如何在從日文跨越到華文時，帶入自身的主體性與文化。我們同意他的分析，特別在於當轉換使用另一個語言時，並非只是原文以不同語言再現。然而，譯腦觀點描述了此現象，卻沒有提供解釋。此外，鍾肇政說他透過翻譯的方式來跨越語言，是否其他或多數的跨語作家在從日文跨越到華文都採用這種方式，仍有待考究。本文將探討外語效應的現象和心智哲學的破碎心智觀點，試圖提出一種觀點，用於理解跨語世代作家在跨越語言時面臨的挑戰，來補足譯腦理論不足之處。

三、語言不只是語言：語言使用切割的心智系統

在這一節，我們將先暫時擱置跨語現象的討論，而轉從心智哲學與心理學的視角，藉由外語效應的經驗研究與破碎心智的觀點，論述不同語言的使用切割了不同的社會環境互動脈絡，使得長期使用某一個語言所習得的社會與環境互動方式、思考與行為習慣、記憶和情緒內容連結，保留在使用此語言時的互動，而無法輕易或完全轉移到另一個語言的使用。這一節建立的觀點，將用於理解台灣跨語世代的經驗，說明跨語世代所經歷的挑戰，不僅是跨越兩種語言的差異，而是兩套心智系統的差異。

24 同註 21，頁 147。曾巧雲論文摘引鍾肇政的這段話，曾巧雲的註腳如下：「鍾肇政著，戴嘉玲譯，〈論台灣文學—從「譯腦」的體驗談起〉，《台灣文學評論》4 卷 1 期（2004.01），頁 98。這是紀錄自 1984 年 9 月鍾肇政於日本天理大學以日文演講的內容。」

(一) 外語效應：語言使用與其他心智面向密不可分的關係

不同語言的使用伴隨不同的認知或行為表現，在母語和外語之間存在特別顯著的落差，此現象在心理學被稱為「外語效應」(foreign language effect)。「外語效應」指人們在使用外語時，在決策上會展現不同於母語的模式。此效應首次由 Keysar, Hayakawa, An 提出，²⁵ 他們透過「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dilemma)，²⁶ 發現當一群受試者在使用外語時，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會比使用母語時來得低。在「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實驗中，受試者得從兩種選項中做選擇：「如果你選擇選項 A，兩百人將被拯救；如果你選擇選項 B，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六百人會被拯救，且有三分之二的機會沒有人被拯救。」選項 B 被設計為比選項 A 更冒險的選項。此外，上述的問法屬於利得框架(gain frame)，選項中所提及的內容是關於可以獲得什麼或拯救的人數或機率。相對地，結果相當的選項也可以用損失框架(loss frame)來問，描述會損失或死亡的人數或機率，而非拯救的人數或機會：「如果你選擇選項 A，四百人會死亡；如果你選擇選項 B，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沒有人死亡，且有三分之二的機會六百人死亡。」。上述為著名的亞洲疾病問題。Tversky & Kahneman 發現，在利得框架情況下，傾向選擇保守的選項(選項 A)，但在損失框架情況下則傾向選擇冒險的選項(選項 B)。²⁷ 此研究結果顯示我們的選擇受到框架所影響，此效應因而被稱為框架效應。回到外語效應，Keysar, et al. 進而研究當使用母語或外語來回應亞洲疾病問題，不同的語言使用是否對選擇的表現造成影響。他們發現當人們在使用外語時框架效應降低，在使用母語時，人們較容易受到框架效應影響。²⁸

在此之後，母語與外語影響的差異，在不同面向上以不同的實驗方法測試。例如，Costa et al. 透過「天橋難題」(footbridge dilemma)，研究使用母語和

25 Boaz Keysar, Sayuri L. Hayakawa and Sun Gyu An, "The Foreign-Language Effect: Thinking in a Foreign Tongue Reduces Decision Bia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3, no. 6, 2012, pp. 661-668.

26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vol. 211, no. 4481, 1981, pp. 453-458.

27 同註 26, pp. 453-458.

28 同註 25, pp. 661-668.

外語進行道德決策時展現的差異。²⁹ 天橋難題是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的一種版本。在天橋難題的情境中，有一輛電車若是繼續行駛，將會撞上前方軌道上的群眾。而你正好站在天橋上，能夠採取的應對方式是推下天橋上的大塊頭來阻擋電車，犧牲天橋上的一個人以拯救在軌道上的數人。Costa et al. 發現，比起使用母語，在使用外語時，受試者更願意選擇推下天橋上的胖子來拯救數人，更接近效益主義者會採取的策略。除了上述的兩個研究，外語效應也透過各種測驗在不同面向上被發現。例如，使用外語時較不傾向於說謊或是誇大，³⁰ 也有研究顯示，使用外語時降低心像（mental imagery）的參與。³¹ 這些因為使用外語而造成不同的認知表現或模式，被統稱為「外語效應」。

要如何解釋外語效應呢？即便外語效應是在心理學領域被認定的現象，造成的原因仍未有定論。目前文獻中有幾種解釋方式：³² 首先，使用母語與使用外語在情緒參與上（emotional engagement）不同。母語是透過情緒豐富的經驗所習得；相較之下，外語習得的歷程參與較少的情緒，或少涉及豐富情感的事件。因此，在使用外語來進行決策時，較不涉及情緒系統的參與。³³ 另一種解釋方式是聚焦在使用母語和外語之間的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差異。³⁴ 比起使用母語時，使用外語時具有較大的心理距離，而使得在傾向以較為抽象的方式

29 Albert Costa, Alice Foucart, Sayuri Hayakawa, Melina Aparici, Jose Apesteguia, Joy Heafner and Boaz Keysar, "Your Morals Depend on Language." *PLoS ONE*, vol. 9, no. 4, 2014, p. e9484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94842>).

30 Bereby Meyer Yoella, Sayuri Hayakawa, Shaul Shalvi, Joanna D. Corey, Albert Costa and Boaz Keysar, "Honesty Speaks a Second Language."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vol. 12, no. 2, 2020, pp. 632-643. (<https://doi.org/10.1111/tops.12360>).

31 Sayuri Hayakawa and Boaz Keysar,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Reduces Mental Imagery." *Cognition*, vol. 173, 2018, pp. 8-15.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7.12.010>).

32 Sayuri Hayakawa, Albert Costa, Alice Foucart and Boaz Keysar,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Changes Our Choic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 20, no. 11, 2016, pp. 791-793.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16.08.004>).

33 Catherine L. Harris, Ayşe Ayçiçe i and Jean Berko Gleason, "Taboo Words and Reprimands Elicit Greater Autonomic Reactivity in a First Language than in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vol. 24, no. 4, 2003, pp. 561-579. (<https://doi.org/10.1017/S0142716403000286>). Stefano Puntoni, Bart De Langhe and Stijn M. J. Van Osselaer, "Bilingualism and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of Advertising Languag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35, no. 6, 2009, pp. 1012-1025. (<https://doi.org/10.1086/595022>).

34 同註 29，p. e94842.

去看待事物。而這種理解方式會使人較為專注結果而非過程，因此展現出較偏向效益主義的決策方式，也較不容易受到框架的影響。³⁵此外，認知的流暢性和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也是在使用母語與外語時的重要差異。使用外語涉及較高的認知負荷，而影響決策上的不同。此外，心像使用的降低是造成認知歷程下游決策差異的原因。

我們認為上述著重不同面向的解釋方式不相互排斥，甚至能綜合成一個外語效應的混合觀點：我們在使用母語和在使用外語時，分別涉及不同的認知模式：在使用母語時，我們的認知模式是涉及豐富情感、較容易連結到從小習得母語過程中的經驗、心理距離較小、也傾向於採用心像；而相較之下，在使用外語時，則少情感參與、心理距離較大、傾向於以較為抽象的方式進行認知處理。

雖然目前研究著重於比較母語和外語使用上的差異，我們認為此差異也會展現在不同外語的使用，例如母語為台語或客語的跨語作家，在使用日語文和華語文之間的差異。尤其當母語只著重於口說，而書寫和創作的學習和訓練是在日語文的環境下，要跨越至以華語文進行創作。我們認為不同認知模式所造成的差異也會展現在日語文的創作和華語文的創作之間。此涉及兩種認知模式的觀點，另可從心智哲學中的破碎心智觀點來理解。以下兩節將從當前心智哲學中的破碎心智觀點延伸去論述不同語言的使用切割出不同的心智系統。

（二）破碎心智：從破碎的信念系統到破碎的心智系統

過去心智哲學家在探討心智結構或是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時，往往主張或預設一個個體只具有單一內在相互融貫（coherent）或沒有矛盾的信念系統，這種觀點被稱為統一性（unity）觀點（請見圖 1）。此觀點的核心內涵在於：在任一個時間點，主體具有對於世界（和自己）的統一的表徵（unified representation），而主體的信念系統是以兩個原則所組織而成：第一個原則為一致性（consistency），要求主體所具有的信念集合是一致、沒有矛盾的；另一個原則是封閉性（closure），意指主體所具有的信念集合是邏輯上封閉的（logically

35 同註 31，p. 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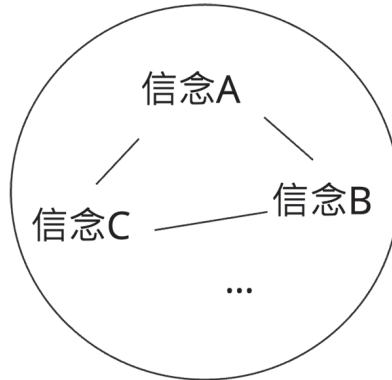


圖1 關於信念系統的統一性觀點：一個個體只具有單一內在相互融貫或沒有矛盾的信念系統。（信念之間的線條代表信念之間的邏輯關係）。

closed），也就是說，主體相信所有信念的邏輯蘊涵（logical implications）。舉例來說，若是一個人相信彰化在嘉義的北方，台中在彰化的北方，則這個人也具有台中在嘉義的北方的信念。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信念指的不只是被動的、一個知識主體所相信的，而是更具有主動性，會引導這個知識主體物理上的行動（physical action）和心智上的行動（mental action）。³⁶前者指的是這個主體如何回應物理上回應外在世界或互動，例如：進行某些發言或採取某種行動；後者則為注意力、決策、思考、回憶等內在的行動。

即便統一性觀點為主流，卻被認為過度嚴格。其中有許多理由，當中最被討論的理由在於一個知識主體似乎常同時具有相互矛盾的信念。一個有名的例子是 David Lewis 提供的：「我以前認為拿索街大致上是東西向；附近的鐵路大致上是南北向；而且兩者大致上是平行的。（這裡的『大致上』是指『在 20 度以內』。）」。³⁷此外，隱性偏誤常被視為具備矛盾信念的例子。我們可能都認識這一種人：口口聲聲主張男女平等或是自稱如何重視某些價值，卻展現出明顯違

36 值得注意的是心智哲學領域所談的信念 (belief) 在概念上與華語口語的信念有些差異。後者常用來指堅信不移的想法，但前者指的是一個人所具有的任何被這個人視為真的想法，但實際上不需要為真，也不需要堅信不移。

37 David Lewis, "Logic for Equivocators." *Noûs*, vol. 16, no. 3, 1982, pp. 431-441, p. 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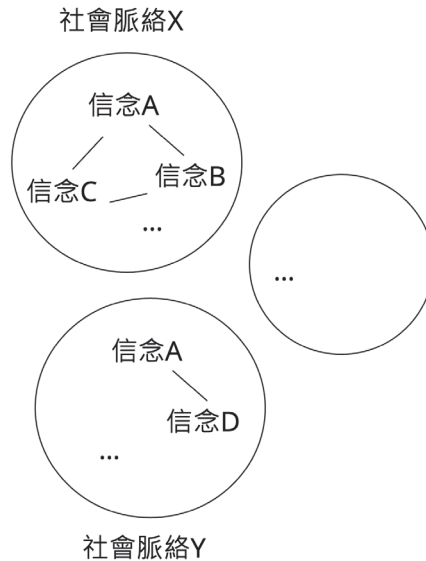


圖2 關於信念系統的破碎心智觀點：一個個體並非只有單一的信念系統，而具有多個信念系統。

背這些價值的行為。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難逃隱性偏誤的影響。針對矛盾信念的問題，為了維持一個信念系統中信念之間的一致性，一些哲學家提出「破碎的心智」（*fragmented mind*）觀點，來替代統一性觀點。³⁸

採取「破碎的心智」觀點的哲學家主張：我們並非只有單一的信念系統，而具有多個信念系統（請見圖2）。也因此相對於過去對於心智或信念系統具備「統一性」的觀點，此觀點主張我們的心智或信念系統是破碎或是零碎的（*fragmented*）。此觀點可以解釋我們為何能有相互衝突的信念：這是因為互相矛盾的信念存在不同的信念系統中，而雖然跨信念系統的信念之間是矛盾的，但單一信念系統中的信念仍維持一致。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的信念系統可能分別對應到不同的（社會）脈絡或情況，而分別在對應的脈絡下活化（*active*）。一個信念系統和其中的信念，是在某一種特定的（社會）脈絡或情況下產生或形塑而成，並且也是在同一種（社會）脈絡或情況下活化，引導個人如何回應情境

38 Cristina Borgoni, Dirk Kindermann and Andrea Onofri, editors, *The Fragmented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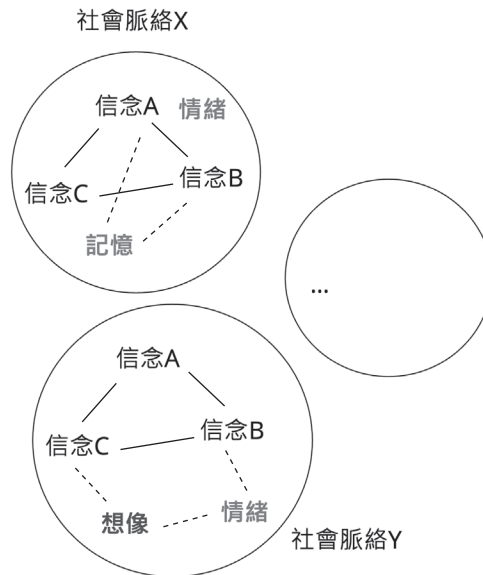


圖3 擴充的破碎心智觀點：不只關注於信念和信念與信念之間的邏輯關係，而包括其他心智狀態和心智狀態之間的關係。（虛線線條表示心智狀態之間的聯結。）

或行動。而我們在下節將論述對於多語言的使用者（包括本文聚焦的跨語世代），母語、外語或不同語言的使用也對應到不同的社會脈絡，各自對應到不一樣信念系統。

當前的破碎心智觀點雖名為破碎「心智」，但實際上只聚焦在信念系統的結構。從此觀點擴展，能提供一個更全面的心智樣貌，不僅僅侷限於探討信念與其之間的邏輯關係（請見圖3）。

我們主張從幾個方向去擴充原始破碎心智觀點：首先，當前破碎心智的觀點聚焦在「信念」和「信念系統」的結構；我們擴充去包含其他心智狀態，包括記憶、慾望（*desire*）、想像、情緒等，甚至其他不具備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的心智狀態。因為範圍不局限於信念，從「信念系統」擴展以「心智系統」來理解。這裡可能遇到一個問題：破碎心智觀點的產生，是為了要解決矛盾的信念和維持信念系統內的一致性。但若是某些心智狀態不具備命題內容，我們要如何探討之間的邏輯關係？這關係到我們提出第二個破碎心智觀點可延伸的面向。

第二，除了聚焦於信念之間的「邏輯關係」，也值得延伸探討它們之間的其他關係，或是信念之外，其他心智狀態之間的關係。在各種關係中，特別重要的是它們之間的「聯結」（association）。這裡指的「聯結」是當一個心智狀態活化時，另一個心智狀態有多容易因此而一起活化。例如，當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是否容易喚起另一件事情。哪一些信念、記憶或其他心理狀態之間的連結較強，就容易一起被活化喚起。例如：想到冬至時，就容易想到湯圓或是喚起過去冬至吃湯圓的記憶。

如此擴充的破碎心智觀點主張在每一個不同的心智系統中，心智狀態之間的連結和連結強度不同。例如，記憶甲與記憶乙在一個心智系統中有強烈的連結，但在另一個系統中則不一定有。此強度之所以不同，跟與心智系統相關的（社會）脈絡和情況有關。相信大家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當在一個情境下（例如：平時工作的場合），某一些事情容易回想（例如：工作相關的內容），但換了一個情境（例如：非工作的私人場合或出國），同樣的事情卻變得不容易被想起。此現象可被擴充版本的破碎心智觀點解釋。由於在不同心智系統下，心智狀態之間的連結關係不同，而使得在不同社會脈絡下，當不同的心智系統被活化時，所展現出的想法、記憶、想像、情緒的參與、決策、認知偏誤的展現便會有所不同。

（三）語言使用切割出的心智系統

我們進入第三節的核心論點：上述擴展後的破碎心智，主張一個個體並非只有單一的心智系統，而是有多個不同的心智系統，分別在對應的脈絡下形塑與活化。而不同的語言使用，往往對應到不同的環境脈絡，而有不同的心智系統去對應；也就是我們在使用不同語言時，活化不同的心智系統，因而展現相異的認知模式（請見圖 4）。

不同語言使用會有如此的效應，核心原因不僅在於語言本身和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許多研究聚焦在此面向，指出不同語言有其特色，因而有利或不利於某一些思考方式或認知處理方式。然而，我們在此聚焦的是個人使用語言時所伴隨的社會互動、脈絡與情境。例如，日本時代，一個在台語家庭出生長大的跨語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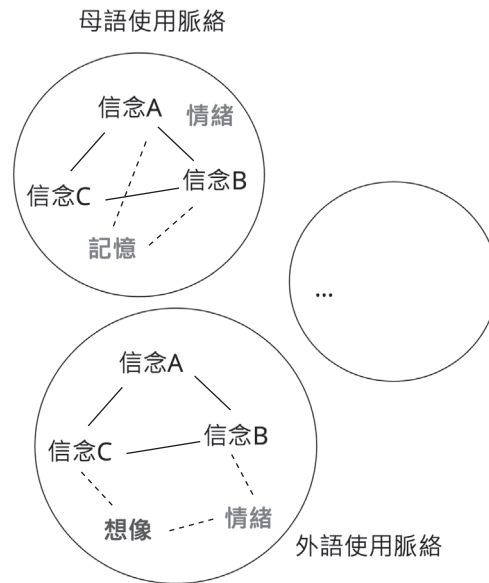


圖4 母語、外語和不同語言的使用常連結不同的社會環境脈絡，切割出不同的心智系統。

家，成長的過程在家與家人使用台語互動，而在公學校或學習和訓練寫作的場合則以日語和日文書寫應對，國民黨推行語言政策之後，則在新的文學環境下要以華語文回應。對這樣背景的作家而言，使用台語時生活經驗、互動方式、情感展現等，不同於使用日語文時的樣貌，而後者也不同於使用華語文。從破碎心智觀點，在使用不同語言時，形塑不同的心智系統，而當往後在使用這些語言時，活化和使用各自對應的心智系統，使得他在使用台語、日語文或華語文的社會脈絡下，展現不同的思考、認知和行為模式。

此觀點為外語效應提供解釋：由於母語與外語的學習和使用情境不同，涉及的情感、決策模式、社會互動習慣、偏誤的形成、心智內容之間的聯結或記憶內容也有其差異，此差異使得在使用母語與外語時有展現不同的認知和行為模式。此解釋與第3章第1節最後所提及的混合觀點一致，外語效應的研究進一步讓我們了解母語使用和外語使用如何不同：在使用母語時，我們的認知模式是涉及豐富情感、較容易連結到從小習得母語過程中的經驗、記憶和習得的知識或建立的想法；而相較之下，在使用外語時，則少情感參與、心理距離較大、傾向於以較

為抽象的方式進行認知處理。外語效應的研究可視為擴展破碎心智觀點的經驗研究，特別是在於情緒參與和偏誤面向。

除了外語效應之外，Schrauf 針對記憶的研究可用來支持母語與外語使用在記憶面向上的差異，包括哪些記憶容易被提取，並且以什麼方式被提取。³⁹ 他分析 24 件涉及雙語雙文化（bilingual-bicultural）使用者的精神分析治療案例，並整理出五種治療中的語言轉換：⁴⁰（L1 為第一語言或母語，L2 為第二語言或第一外語。）

- 在 L1 中使用的某個特定詞觸發一個特定的記憶，通常是具有強烈情感或引發焦慮的記憶，而且在 L2 中未被提取。
- 在治療語言中，從 L2 大規模轉換到 L1 而促進大量與童年或青年時期相關記憶的提取，這些記憶在 L2 中未被提取。
- 之前在 L2 中可提取但以簡略形式出現的記憶，或缺乏適當情感伴隨的記憶，在 L1 中被提取時，則包含細節並伴隨強烈的情緒。或者，L2 被策略性地採用來保持與個人回憶的觀察者距離，L2 作為一種「經驗疏遠」（experience-distant）而非「經驗貼近」（experience-near）的語言。
- L2 作為當前自我概念的語言和文化媒介，同時與 L1 連結的過往自我和童年或青年保持距離。
- 在治療過程中，針對治療師的情緒爆發發生於 L1，而 L1 在治療的其他時間並未被使用。⁴¹

此分析可以用來支持不同語言的使用所切割出的心智系統，有利於某些記憶的提取，並且影響提取方式和情緒的參與。

39 Robert W. Schrauf, "Bilingu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Clinical Cases." *Culture & Psychology*, vol. 6, no. 4, 2000, pp. 387-417. (<https://doi.org/10.1177/1354067X0064001>).

40 也參考 Robert W. Schrauf and David C. Rubin, "On the Bilingual's Two Sets of Memorie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obyn Fivush and Catherine A. Hade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3, pp. 121-145.

41 以上五種治療中的語言轉換，由筆者自行翻譯自 Schrauf 和 Rubin。同註 40，p. 125.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外語效應和 Schrauf 的研究聚焦於母語和外語使用上的差異，此分析也適用於其他類型的語言使用差異，例如兩種外語的使用，只要這兩種有一定程度不同的社會互動脈絡和情境。當此分析要應用於台灣跨語世代的作家時，應該特別注意其特殊之處，難以簡單用母語和外語區分，主要是因為台灣經歷許多語言轉換，以及台灣本土語言的書寫系統在當時沒有被廣泛運用於創作，使得日語文對跨語時代作家有其特殊性。我們會在下一節更詳細說明。

四、跨語現象的心智系統

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如何提供新的方式來理解跨語經驗呢？本節將以此理論觀點出發，提出對於跨語現象的假說，並以林亨泰作為案例分析來支持此觀點。未來需要更多對跨語世代文學的分析，和作者生平經歷的考察，來提供更完整的論述。

（一）以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來理解跨語現象

根據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語言使用的情境切割出相互獨立的心智系統，也就是不同語言情境有各自對應的心智系統，使得在這些情境下，展現出長期培養而來、相應的認知和行為模式。經歷過跨語的台灣人，因為政治歷史因素，習得多種語言，包括自身的母語像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言、在日本統治時代下所習得的日語文（對某些生於日本時代的人而言，這是最流利的母語）、以及國民黨來台後所推行的華語文。這些語言的使用，有各自的社會情境和脈絡：兒時的家庭生活中使用母語，若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人，日語的使用則是在公學校或其他必要場合。當然在 1920 年後，有一些漢人在家庭內，也改採用日語溝通。而華語對許多生於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來說，則是在 1947 年之後，國民黨推行語言教育政策後，在學校、補習班所習得的語言。相較於台灣本土語言和日語文，華語文是這批台灣人較晚才學習的語言，為他們的第一、第二或甚至第三外語。接觸華語文的時間點，依出生年分、工作條件或生活環境而有所不同。

不同的語言使用有各自對應的社會情境和脈絡，培養出的不同的認知和行為

模式以及習得的記憶、知識和想法。例如，兒時的家庭生活中使用母語（台語文、客語文、原住民語言、或日語文），母語連結的是兒時的記憶、情感、決策的模式、偏誤、世界觀等，使用的脈絡涉及豐富情感，對應的心智系統有更多情緒參與。因此對個別作家和創作者來說，母語使用時所涉及的心智系統，讓母語表達的方式更為生動且伴隨更多細節，而內容方面則較容易包含母語使用時的記憶，以及那時所形塑的想法和知識。相較之下，新的語言學習、使用情境和脈絡往往較為單調，學習的方式也通常較為制式，不像在學習母語時，同時學習自我與他人、社會與環境的關係，涉及重要的人生經驗和記憶。因此，在外語的使用脈絡下，認知運作較不涉及情感、兒時記憶與細節，並以較為抽象、心理距離較大的方式進行。

以破碎心智觀點來分析跨語世代的作家，另一層考量是，他們在進行創作、思想工作和過往學習養成階段時，是使用什麼語言，而此語言在經歷跨語後，是否仍然能夠用於或輔助創作？這關係到，原本用原語言創作時所採用的心智系統，是否還能用於創作或輔助創作。新的語言創作若要生成，代表他們需要開拓新的心智系統，來支持新語言下的活動。生於日本時代的作家，在成為作家養成的過程，若他們對應日語文創作的心智系統在長期學習和歷練中逐漸穩固，並且仰賴此系統，用日語文創作、和文壇或學術社群交流，當推行語言政策後，他們無法再以日語文創作，只能以華語文創作時，這些作家無法再仰賴原本的心智系統。他們所面臨的不只是學習一個新的語言，而是必須重新塑造一個適用於華語文創作的心智系統。華語文創作的心智系統若要發展，如同本土語言或日語文心智系統的發展過程，需要經驗和時間去形塑；這個系統所發展出的樣貌，受到在形塑過程中，他們遭遇的經歷和個人回應方式所影響。要能夠建構出一個新的、富有情感、能順暢連結過往記憶的心智系統，其困難度之高。所以，探討個別作家和創作者的跨語歷程，若是單純從學習新語言的方式理解，是無法捕捉的。⁴²

使用不同語言時，就會活化不同的心智系統，來回應當下社會情境的需求。

42 跨語作家如鍾肇政採取翻譯的方式來回應挑戰，從破碎心智觀點來看其跨語的門檻會降低一些，因為作者仍是以原本語言所對應的心智系統來創作。但從原語言翻譯成華語文，在選擇使用字眼和表達方式時，仍然會因為無法仰賴原本的心智系統，有相應的困難。

這意味著，跨語時代的作家，因為國民黨推行的語言政策，必須學習新語言時，他們要學習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語言能力，同時要形塑出一套新的心智系統。這一套新的心智系統依據使用此語言的社會情境，開展出適合回應的認知和行為模式。不幸地，這代表著當台灣跨語作家或台灣人被禁止使用母語或原本慣用語言（例如，日語文作為慣用的創作語言），所造成的不只是語言流失。根據擴充的破碎心智觀點，他們因為無法持續使用母語和慣用語言，同時失去一套心智系統，失去被過往經驗形塑的認知和行為模式，其中也可能失去某些母語和慣用語言使用時的記憶、回憶的型態、情緒的參與方式等。這點出語言政策所造成的一種尚未被探討的語言不正義，而這種不正義不只發生在跨語世代，也發生在之後獨尊華語文（近期包括英語文）的台灣社會。

日語文之於台灣跨語時代作家，有值得特別注意的複雜性：首先，1937年日本政府在台灣強制使用日語文，而在1946年國民黨強制推行使用華語文，當時的作家身處複雜和變動的語言環境。因此，依據他們出生和創作的時代背景，台灣跨語作家的來源語可能包括台灣本土語言和日語文，而目標語則可能包括日語文和華語文。在分析時，須針對個別作家的時期、其語言和成長背景，來進行探討。第二，以台語作為母語的作家，他們在書寫或寫作上的「母文」可能不是台文。因此，他們在開始學習書寫和作家的培養過程所使用的語文，對他們而言有其雖不是母語，但又不只是外語文之處。而對於某些二戰後的台灣跨語作家而言，這可能是日文。由於這兩個特點，關於台灣跨語作家的分析，我們雖從心智哲學提供一個分析觀點，但由於各作家的背景差異大，不應該將他們視為一個整體一起討論，而應從他們各自的個人語言和創作歷史來探討。下一節，我們將以林亨泰來進行案例分析。

（二）林亨泰與他的作品作為案例分析

接下來我們將從林亨泰不同時期的詩作，看他如何描寫人與自我，說明作家文字技巧和內容的差異，與不同語文系統對應到的不同心智系統的運作，有所關聯。也就是說，我們將展現，如何透過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來分析跨語作家的

背景和作品。

1941年18歲的林亨泰，開始嘗試用日文寫作新詩。1946年12月國民政府全面禁止報章雜誌使用日文，不過戰後最初幾年，本省籍作家仍有用日文創作的空間，林亨泰和其他文友在銀鈴會同人誌《潮流》發表日文作品。此外有歌雷（本名史習枚）主編的《新生報》橋副刊，讓戰後還不熟習華文的本省籍作家，有刊登的園地。

1948年4月楊達至林亨泰就讀的臺灣師範學院演講，林亨泰受到鼓舞。他先以日文創作，請林曙光譯成華文發表，四個月後開始嘗試跨越語言以華文書寫。8月《新生報》橋副刊150期刊登他的作品〈靈魂的秋天〉：「剛破滅了美麗的好夢之後／不能再像一個皂沫般的輕浮／於是情感冷卻 意志來了／（略）／但妳 經年凋落的美人呀／今天 妳是不是欲嗅著死神的體臭／感覺到那靈魂的顫抖？」⁴³ 這首詩以華文面世。從目前資料，我們無從得知，此篇是否經由林曙光翻譯才投稿，或者林亨泰是直接以華文寫成的。不過按照創作歷程來看，這個時期，林亨泰仍然主要仰賴日文來吸收知識和思考。⁴⁴ 分析其文句，主述者傷感於美夢破碎，同時呼叫著「美人呀」來惋惜她的凋零；林亨泰的筆觸充滿感情，並且直抒胸臆。

上面這首1948年刊出的華文詩，呼應林亨泰在銀鈴會用日文寫詩的風格傾向。具體來說，林亨泰在銀鈴會刊物上的詩風如何？銀鈴會先後發行《緣草》和《潮流》兩份同人誌，這個文藝組織的活動時間是1942-1949年，等於橫跨了戰前到戰後。蔡明諺針對銀鈴會的研究指出，林亨泰是成員中擺盪在夢和現實之間，最不穩定的例子。有時候他的作品和朱實、楊達等人較靠近，回應社會時局；有時候他的作品和詹冰（綠炎）等人相近，抒情浪漫。銀鈴會刊物對林亨泰（亨人）的介紹詞說他「結合哀愁的浪漫與美麗的格調，打動人心。」

後退來看，〈靈魂的秋天〉這首詩似乎也為林亨泰接下來的文藝生涯，提供了苦澀的預言。1949年爆發四六事件，部分成員被捕，導致銀鈴會停刊。在政

43 林亨泰著，陳昌明編，《林亨泰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12），頁110。

44 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林亨泰全集十 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卷》（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頁177。林亨泰於師院求學期間，經常到圖書館借閱日文的文學書籍。

治緊張的氣氛下，林亨泰第一本日語詩集《靈魂的產聲》於4月15日發行。5月份，政府宣布戒嚴。銀鈴會解散後，因為政治的肅殺和跨語障礙，首部詩集出版不久，林亨泰即停筆寫作。他從18歲起對詩產生興趣，青年階段於四〇年代所寫的日文詩作，好不容易集結而成的產物，終於揚發出來的靈魂之聲；卻因種種局勢變動與壓迫，使人顫抖和沉默。這一停筆就是6年。

1954年林亨泰在書店偶然讀到紀弦主編的《現代詩》季刊，發現這和過去接觸過的日本現代文學有重疊之處，才重新點燃了寫作的動機。林亨泰奔回家，在藏書中找到神原泰的未來主義作品，以及其他的日本前衛文學著作。林巾力描述到這一段歷程：「當林亨泰在面對一本標榜著『現代』的刊物時，他的反應，首先是轉身朝向他的『過去』，他打開屬於日治時期的那段記憶，以及在當時所蒐集而來的日文書籍。於是，他找到的是那些曾經『亂讀』過的、包括未來派在內的前衛作品，其中當然是混雜了透過日語轉譯的有關西方前衛運動的介紹，還有以日文為實踐媒介的前衛作品。所以，當面對『現代』的概念並開始思索他自己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實踐角色時，詩人所找到的，是經過了時間與空間壓縮的現代主義綜合體。」⁴⁵

1955年春天，林亨泰重新拾筆，以筆名恆太在《現代詩》9期現蹤，這是五〇年代他最早發表的詩作。3月，他出版第一本華文詩集《長的咽喉》，其中〈長的咽喉——代序〉這首短詩，便能發現不太一樣的文字情態，與四〇年代的抒情不同：「有長的咽喉／鳴著圓舞曲／而告知／從軟管裡／將被擠出的／就是春」⁴⁶這不是邏輯通暢的字句，軟管裡如何能夠擠出春呢？林亨泰在此運用了跳躍的意象，把抽象的概念並置。回到作家身上來說，似乎也昭示著，他將用奇異的詩技，開啟下一段文學旅程的春天。

「現代主義或前衛所主張的革命性與破壞性，倒是提供詩人一個翻轉語言劣勢的可能。」林巾力引用1965年2月《笠詩刊》5期，林亨泰對於錦連五〇年代詩作的評論，來描述這些跨語作家戰後另類的書寫策略：「『優美性』成為其

45 林巾力，〈想像「現代詩」：以林亨泰五〇年代的「現代主義」建構為例〉，《中外文學》35卷2期（2006.07），頁111-140。

46 林亨泰著，陳昌明編，〈長的咽喉——代序〉，《林亨泰集》，頁26。

短處，而『拙劣性』卻成為其長處了。」他們利用破中文來達到弄拙成巧的效果。意思是說，跨語作家們較無法書寫流暢優美的文句，便反過來抓住可把握的字詞，堆疊和設計出奇巧的內容，以此傳遞詩意。這種書寫技巧和日本現代主義文學的主知高度呼應，而「主知」詩風是提倡理性和計算的。⁴⁷

林亨泰如何一邊建構新的語言系統，一邊摸索著用破中文來創造詩意。1955年《長的咽喉》詩集中〈夜曲〉相當有代表性：

喋不休的 我的筆
 我的筆 該擱置的時候
 一……儿 \ ……么弓……
 又 \ ……尸 / ……一 \ 夕 丂 \ ……
 聽聽
 那些我心臟之跳動的深落於
 死寂之中的活生生的聲音
 一……儿 \ ……么弓……
 又 \ ……尸 / ……一 \ 夕 丂 \ ……
 聽聽
 那些繼續不斷地來找尋我的
 那些活生生的鳴動的聲音⁴⁸



戰後重新學習華語文，作家需要像小學生那樣從勺勺口口學起。可是林亨泰並不遮掩這項語文劣勢，反而把勺勺口口視作可操弄的文字符號，在這首詩裡頭，製造出一種倏忽中斷和拖冗的節奏感；彷彿主述者心底有話想說，語言還在組織中，發音很慢，可是聲音沒有消失。主述者一開始有千言萬語，卻還是無奈擱筆了。一二三五十百的注音符號出現，像是不甘願靜默的細碎低語。仔細聽，心臟深處


47 同註 45，頁 135。

48 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夜曲〉，《林亨泰全集二 文學創作卷 2》（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頁 14-15。

還有活生生的聲音，注音符號第二次出現，加強這股鳴動的不放棄。作者不直接悲呼跨越語言有怎樣的困難，有話說不出口是怎樣的感覺和狀況，林亨泰用抽象的形式，在詩中表現。他在五〇年代的其他作品，〈房屋〉、〈輪子〉、〈騷音〉、〈車禍〉等符號詩，同樣是高度抽象的文字操作。

綜覽其創作，林亨泰是對哲學本體論、人類本質存在相當關懷的作家，以下就林亨泰不同時期，談論人和自我的詩作，來比較其寫作技法差異。1948年5月載於銀鈴會刊物《潮流》春季號〈人的悲哀〉：「生命是愚蠢的，生命是悲哀的／可是無法超越，這就是人的一切／瞭解了這點是一件悲哀的事／可是又不能不瞭解／人到底只不過是動物的一種罷了」、「人的唯一的存在是『自我』／擁有這樣哲學的人類永遠無法得救／可是在一切悲愁之中／仍能凝視著美的人啊／您總是會得到補償的」⁴⁹ 這首詩原本是用日文寫成的，充滿悲嘆。

林亨泰加入紀弦的現代派後，1956年2月於《現代詩》13期發表〈人類身上的鈕扣〉，同樣在描述人的本我狀態：



給自尊
 有所自我救濟
 螺絲
 許多螺絲
 把這空洞的
 箱子
 頭部胸部間
 胸部兩手間
 胸部腹部間
 腹部兩脚間
 擰住了⁵⁰


49 此處華文版本是林亨泰自譯，《爪痕集》（台北：笠詩刊社，1982.02）。引用自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人的悲哀〉，《林亨泰全集一 文學創作卷1》（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頁62-63。

50 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人類身上的鈕扣〉，《林亨泰全集二 文學創作卷2》，頁94。

這首詩裡，人類被描述成一個空箱子，不同部分的軀幹和四肢，用螺絲連接和固定住。和前詩〈人的悲哀〉所說，人充其量是一種動物，有類似的意涵，彷彿人類能夠確定的所謂自我，僅是這一個物理實體。那些精神性的自我追求，都是徒勞，是無可超越、是愚蠢和悲哀的。這樣的悲愁在〈人的悲哀〉一詩中，作家用充滿感性的語調直面鋪陳。然而在〈人類身上的鈕扣〉一詩中，詩作手法顯然抽象許多。作家挪移文字的空格，頭部手腳等身體部位，在視覺上變得懸空，僅靠「箱子」和「擰住了」前後兩句，勾掛住。這樣空蕩蕩活著的人類，更像是個被螺絲擰住的機器人，虛存於世間。

兩首詩分別在四〇年代和五〇年代完成，〈人的悲哀〉是用日文發表，〈人類身上的鈕扣〉是用華文發表。根據破碎心智觀點，我們想要指出更重要的差別：類似的主題，林亨泰用兩種語言去提取和靠近時，採用了不一樣的心智系統，所以在呈現方式上，才有富含感情與較為抽象的這層差異。

有趣的是，七〇到九〇年代，林亨泰仍有零星詩作是先用日文寫成，再譯成華文。1988年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長詩〈美國紀行〉第二段，也有對於人性本質的描繪：



在東方的時間裡
沒有做為一個人的人
只有做為人的一個人
人在做為人的一個人時
重要的是如何去伺候人
因此，人的一個
 改說一粒也好
 改說一根也好
 或許
 改說一隻也無妨⁵¹

51 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美國紀行〉，《林亨泰全集三 文學創作卷3》（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這首詩開頭，主述者先說自己提著東方的時間，「立於西方的時間裡」。這裡所說的時間，指的是更廣泛的社會氛圍和精神思想。詩中所說「一個人」意指人被當成獨立個體對待時，有主體性且受尊重。人如果只是「人」，而不是「一個人」，就會被支配，被期待要去伺候人，要去屈從他人。那樣沒有主體性的人，稱不上是「一個人」，說他是一粒米、一根棍子、一隻動物還更貼切些。這段詩句看似抽象，其實是在內容上抽象，因為蘊含哲學性的辯證；形式上，是直觀且有邏輯的。和五〇年代的華文詩作相比，〈美國紀行〉沒有抽象的詩法，沒有玩弄符號和段落編排，更像是充滿哲思的論述詩，文字直白可解。

〈美國紀行〉裡面還寫到，作家耳邊充斥聽不懂的語言，走在完全不認識的道路和城鎮。這股衝擊觸動他的內心：「猛然想到／被趕出故鄉的人／失去故鄉的人／那沉默、執著的心／不就也是我現在的心情嗎？」按照年表所記，這一趟美國行，林亨泰受邀去麻州大學參加台灣文學研討會，於會議上發表〈「銀鈴會」史話〉論文，同行者有巫永福和李魁賢。⁵²想必作家所說「現在的心情」包含，身為跨語世代的這群人，好像活在故鄉台灣的土地，語言文字層次卻被拔根，精神上像被逐出了故鄉的那種流離之感。

林亨泰這一首八〇年代用日文寫成的長詩，再次支持了本文論點，雖然日語文並非他的母語，但他從學生時期便使用日語文學習、思考和接觸詩和文學，日語文為他生命中重要階段（幼年和青年）的使用語文系統，也是他跨語之前創作的主要語文系統。當他用日語文去體會和反芻美國旅行的見聞，動用到在人生重要階段發展出的的心智系統，是較有感情的，也因此，作品的表現形式較實際、不抽象，內容有更多細節與情緒。

極少論者注意到林亨泰作品中的感情面向，但從林亨泰後來的詩論，可以看出他在思考詩的本質時，給予情緒和感受相當的地位。他援引心理學，把人類感情分成四個層次，並且分別對應到詩歌發展的不同時期：感官的感情代表歌詠時期，生命的感情代表民謠時期，心情的感情相當於抒情詩時期，精神的感情對應

1998.09），頁 58。按編者的說明，〈美國紀行〉約寫於 1985 年，林亨泰自美返台後不久，原以日文書寫，經林耀德商請陳寶蓮翻譯後發表。

52 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林亨泰生平著作年表〉，《林亨泰全集十 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卷》，頁 225。

到現代詩時期。精神的感情是最高層次的感情，凌駕於前面三個層次之上，「將一切歸統於價值世界，如憧憬、世界苦、歸依之心等。」是人格核心與世界本質合而為一的狀態。⁵³ 我們可以發現，林亨泰從宏觀詩史來界定的現代詩，包含人的憧憬，還有對世界的戀慕與苦澀，裡頭蘊含情緒。

九〇年代的研究論述，似乎一逕強調林亨泰於五〇年代的抽象詩風。早期論者看林亨泰在四〇年代用日文寫成的作品，不自覺也會戴上「知性」的濾鏡來審視。林耀德說，林亨泰受春山行夫主編的《詩與詩論》影響，「反抒情、主知的語言傾向在當時已現端倪。」⁵⁴ 然而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林亨泰在銀鈴會時期的日文詩作，並不全然背向情感。況且以寫作手法來說，四〇年代日文詩的抽象程度和結構性，大大不及五〇年代用華文寫成的詩。不該因為林亨泰符號詩的特出，而忽略其他時期日文作品的情感成分。

分析林亨泰的詩作和詩論，得出的結果，印證本文主張。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認為，不同語言對應不同的認知模式。母語或年輕時期慣用的語言，較容易連結到從小學習和使用該語言時的生命經驗，所以人們在使用這些語言時，涉及較多回憶和情感。相反地，使用外語或生命較晚才習得的語言時，較少情感參與，心理距離較大，傾向於用較抽象的方式進行認知處理。林亨泰用兩種語言思考和創作，作品呈現出不同調性；可能因為政治環境改變，有這些外在因素在作用。畢竟 1949 年銀鈴會因四六事件解散，期間多位成員包含林亨泰，紛紛遭到政府約談和抓捕。不過從作家內在來看，我們認為書寫風格以及詩作美學之差異，有相當程度，是因為不同語言對應到兩種心智系統，導致作家運用不同傾向的認知模式在創作。

53 康原，〈訪林亨泰談文學創作中的情感〉，呂興昌編訂，《林亨泰全集八 文學論述卷 5》（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頁 51-54。原載於《台灣日報》1979 年 3 月 3 日。本篇訪談錄是由林亨泰口述，康原筆記而成。

54 林耀德，〈疾射之箭·每一剎那皆靜止〉，呂興昌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2 林亨泰》（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03），頁 194。

（三）未來研究發展

跨越語言前後，作家選擇的創作文體或書寫風格有所差異；銀鈴會成員不只林亨泰出現這種現象。張彥勳原本用日文寫詩，戰後則是用中文創作寫實小說。同樣生於日本時代的葉石濤，跨語前後的書寫風格與文體也相當不同。除了政治現實限制，作家的美學選擇和改變，背後有哪些受語言影響的意識機制在作用，值得進一步論述和探究。

從台灣哲學史的角度來說，洪耀勳（1903-1986）在二戰期間，曾赴日本占領下的北平任教；曾天從（1910-2007）則是在滿洲國教書。兩人都在日本取得學位，他們在中國華北、東北活動期間，接觸到多少程度的華語華文？具體而言，他們在哪個階段開始學習新語言？有台灣第一位女哲學家之稱的林素琴（1923-2015），和林亨泰、銀鈴會世代差不多年紀，戰後應當也遇過語言的問題。⁵⁵ 上述三位戰後都在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當時學院內用何種語言授課？師生的語言組成狀況如何？這些台灣哲學家跨越語言的歷程是什麼？語言轉換如何影響他們的哲學思考、著書立說以及職涯發展？

以洪耀勳來作更具體的案例說明。他曾於 1932 年用日文發表〈創造臺人語言也是一大使命〉，並於 1936 年提出「台灣風土論」，融合歐洲和日本哲學，探討台灣文化風土的特殊性。戰後他回到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顧忌政治氛圍，洪耀勳將研究重心轉向存在主義。洪耀勳和同時代台灣作家一樣面對跨語障礙，戰後新的國語，對他來說已是他習得的第五種語言。在學生眼中，他是個講課無趣、表達能力不好的教授。⁵⁶ 根據其學生的回溯，洪耀勳用華文寫成的學術文章，在發表前還曾請學生孟祥森幫忙潤飾。⁵⁷ 戰後他在台大哲學系對學術自由的維護和堅持，被認為是一大貢獻。在這種視角之下，戰後洪耀勳發表的哲學論著，似乎就變得較無討論價值。以本文提出的「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來看，或許這些

55 吳秀瑾、陸品妃，〈臺北帝大唯一臺籍哲學學士林素琴〉，洪子偉、鄧敦民編，《啟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07），頁 435-476。

56 洪子偉，〈臺灣哲學盜火者——洪耀勳的本土哲學建構與戰後貢獻〉，《臺大文史哲學報》81 期（2014.11），頁 113-147。

57 李日章，《赤峯街 5 號的那些事》（台北：玉山社，2015.02），頁 164。

跨越語言的台灣哲學家，其作品之內涵與意義，另有值得討論之處。

不只作家和哲學家面臨跨越語言的挑戰。和林亨泰生於同一年的台語片導演辛奇（1924-2010）同樣在工作現場，有跨越語言的問題。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資料提及：「1968年，辛奇執導國語片《醉俠神劍》，影片由原拍台語片的永裕電影公司投資，面對語言轉換，雖然辛奇早期在軍中劇團已具備國語聽力，但在拍片現場只能先向副導演說明，由副導演來排練，最後才由他驗收成果，為把導演工作做好，辛奇開始硬學國語。產業推移與優勢語言的興起，一方面破壞了台語片固有的拍製模式，另一方面卻激發了台語影人的潛力，長年累積的功力在國語電影中驗收轉化。」⁵⁸ 具體而言，語言如何影響辛奇對腳本和對白的掌握，甚至是執導時與演員的溝通、現場調度。這些問題若能進一步探討，將有助於更深入理解，必須跨越語言的那一代電影工作者，以及電影產業內部之變遷。在此舉台灣哲學家 and 電影人為例，是為了指出，台灣文學界已對跨語現象累積稍具規模的研究；既有的研究取徑，以及本文提出的嘗試，或許能為其他領域提供參考。

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要跨越的語言也不只是日語文到華語文，或者台語文到華語文。賴慈芸《台灣翻譯史》書中涉及的翻譯語種相當複雜，漢語文言到白話文的語內翻譯、日語到白話漢文／華語、中國古典文言到日文、英文到中文、中文到英文。從這些研究可以知道，台灣內涵的語種複雜，當今社會還有原住民族各個部落的語言，以及多種新移民的語言。

台灣歷史面臨多次殖民，族群組成多元，不同政權強制推行的語言文化政策，使得這塊方土上，許多人都有語言經驗破碎、與母語斷裂、與父母輩慣用語言斷裂，或者被迫操用自己不熟悉的語言來謀生生活，這類的遭遇。如果把「跨越語言」擺回歷史來看，對每個作家和知識分子來說，不只是「學習一種新的語言」這樣單純的事。這些社會與個人的變因，如何疊加作用，繼之影響整個台灣精神文明的發展，我們還有許多待琢磨之處。因為這個討論在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

58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蘇蔚婧〈跨越——辛奇的本事〉（來源：<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26de7187154d79fd38d5a936fe30e4df#basic-82o386e6or>，檢索日期：2024.12.31）。

領域已稍具規模，本文希望從「跨語世代」這個論題出發，開展出更大的關懷視角：有過這種集體遭遇的人們，具備怎樣的心靈感知特質？跨語世代這群人的自我、記憶和語言系統，可能共享哪些運作模式？繼之架構成台灣精神文化史的一個向度。

五、結語

本文提出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可用於分析台灣跨語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跨語處境。根據此觀點，跨語不單單只是習得新的語言，並且學習使用新語言創作，而是要重新形塑一個心智系統的過程。未來的研究可借重這個理論，來分析這些作家的語言使用脈絡和生命經驗，以及他們用不同語言創造的內容和風格，例如：作品中涉及哪些關於過往的記憶，情感在作品中的參與，寫作的風格細節程度等。最後值得一提，此破碎心智觀點不只適用於探討跨語世代，也可用於探討其他個人的語言相關現象，例如：語言沒落（*language attrition*）。語言沒落指一個人可能因為政府的語言政策或移民，而失去母語能力。這個觀點也可用於延伸論述語言政策所帶來的不正義。

過去文學研究大抵把跨語現象，當成作家個人生命或創作歷程中，其中一項外緣因子。學者們關注政治現實、語言政策和外省籍作家在副刊的優勢地位，這些面向的影響，但是如果一味強調外在條件，彷彿跨越語言的知識分子只是被動接受環境，外在侷限之下，他們沒有任何主動性。從擴展的破碎心智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更細緻地瞭解個別創作者的內在處境；可以注意到，在多種語言的裂隙之間，哪些東西被破碎地保留了，哪些被破碎地延展了。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10）。
- 呂興昌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2 林亨泰》（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03）。
- 李日章，《赤峯街 5 號的那些事》（台北：玉山社，2015.02）。
- 林亨泰著，呂興昌編訂，《林亨泰全集一 文學創作卷 1》（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
- 著，——編訂，《林亨泰全集二 文學創作卷 2》（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
- 著，——編訂，《林亨泰全集三 文學創作卷 3》（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
- 著，——編訂，《林亨泰全集八 文學論述卷 5》（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
- 著，——編訂，《林亨泰全集十 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卷》（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09）。
- 著，陳昌明編，《林亨泰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12）。
- 洪子偉、鄧敦民編，《啟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07）。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
- 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0）。
-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
- 龍瑛宗著，陳千武、林至潔、葉笛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 隨筆集（2）》（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
- Borgoni, Cristina., et. al. editors. *The Fragmented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Fivush, Robyn and Catherine A. Haden, editor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3.

二、期刊

- 何致和，〈語言越境、形象自塑與文化交融——李琴峰非母語書寫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0期（2021.12），頁361-390。
- 林巾力，〈想像「現代詩」：以林亨泰五〇年代的「現代主義」建構為例〉，《中外文學》35卷2期（2006.07），頁111-140。
- 林佩欣，〈日治時期的教育統計資料〉，《台灣學通訊》70期（2012.10），頁6-7。
- 柳書琴，〈跨時代跨語作家的戰後初體驗：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1945-1947）〉，《台灣文學學報》4期（2003.08），頁73-105。
- 洪子偉，〈臺灣哲學盜火者——洪耀勳的本土哲學建構與戰後貢獻〉，《臺大文史哲學報》81期（2014.11），頁113-147。
- 曾巧雲，〈從譯腦到殖民地經驗的再翻譯——初探跨語世代的後殖民翻譯〉，《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2期（2011.04），頁135-161。
-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223-270。
- 黃意雯，〈從銀鈴會同人誌看跨時代作家如何跨越〉，《台灣應用日語研究》18期（2016.12），頁87-104。
- 葉高華，〈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臺灣語文研究》13卷2期（2018.10），頁247-273。
- 蔡明諺，〈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期（2015.04），頁41-71。
- Costa, Albert., et al. "Your Morals Depend on Language." *PLoS ONE*, vol. 9, no. 4, 2014, p. e9484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94842>).
- Harris, Catherine L., et al. "Taboo Words and Reprimands Elicit Greater Autonomic Reactivity in a First Language than in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vol. 24, no. 4, 2003, pp. 561-579. (<https://doi.org/10.1017/S0142716403000286>).
- Hayakawa, Sayuri and Boaz Keysar.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Reduces Mental Imagery." *Cognition*, vol. 173, 2018, pp. 8-15.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7.12.010>).
- ., et al.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Changes Our Choices." *Trends in Cognitive*

- Sciences*, vol. 20, no. 11, 2016, pp. 791-793.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16.08.004>).
- Keysar, Boaz., et al. "The Foreign-Language Effect: Thinking in a Foreign Tongue Reduces Decision Bia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3, no. 6, 2012, pp. 661-668.
- Lewis, David. "Logic for Equivocators." *Noûs*, vol. 16, no. 3, 1982, pp. 431-441.
- Puntoni, Stefano., et al. "Bilingualism and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of Advertising Languag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35, no. 6, 2009, pp. 1012-1025. (<https://doi.org/10.1086/595022>).
- Schrauf, Robert W. "Bilingu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Clinical Cases." *Culture & Psychology*, vol. 6, no. 4, 2000, pp. 387-417. (<https://doi.org/10.1177/1354067X0064001>).
-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vol. 211, no. 4481, 1981, pp. 453-458.
- Yoella, Bereby Meyer., et al. "Honesty Speaks a Second Language."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vol. 12, no. 2, 2020, pp. 632-643. (<https://doi.org/10.1111/tops.12360>).

三、電子媒體

-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蘇蔚婧〈跨越——辛奇的本事〉（來源：<https://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26de7187154d79fd38d5a936fe30e4df#basic-82o386e6or>，檢索日期：2024.12.31）。
- Krasinski, Jennifer. "Ágota Kristóf and the Uses of Illiteracy," *The New Yorker*（來源：<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second-read/agota-kristof-and-the-uses-of-illiteracy>，檢索日期：2025.04.15）。
- Oyeyemi, Helen. "The Rebel Vocabulary of Ágota Kristóf: Helen Oyeyemi on Kristóf's memoir *The Illiterate*," *Literary Hub*（來源：<https://lithub.com/the-rebel-vocabulary-of-agota-kristof/>，檢索日期：2025.04.15）。
- Robson, David. "I couldn't believe the data': how thin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improves decision-making," *The Guardian*.（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3/sep/17/how-learning-thinking-in-a-foreign-language-improves-decision-making>，檢索日期：2024.12.12）。